

朱学渊 著

秦始皇

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

“五帝”是爱新氏，“华夏”是回纥国

“姬姓”和“九姓”，就是通古斯血缘氏族

中原复姓与戎狄族名的关联

以“橐杙”为中华民族寻根

匈牙利人与女真民族同源

“安息”是“爱新”，“条支”是“女直”

“大秦”是阿塞拜疆，不是罗马帝国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朱学渊 著

秦始皇

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朱学渊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ISBN 978 - 7 - 5617 - 5498 - 6

I. 秦… II. 朱… III. 历史—语文—研究 IV. K827=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9205 号

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

著 者 朱学渊
策 划 朱杰人
文字编辑 李 雯
责任校对 侯骏华
装帧设计 黄惠敏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upress.com.cn

印 刷 者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7.75
字 数 173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
印 数 51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7 - 5498 - 6/K · 294
定 价 1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前言



读过台湾历史智库出版公司出版的《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一书的一位朋友，认为有出一个简体本的必要，我转告了东年先生，他不仅慨然允诺，而且还说：“出这样的书，都是为了公益。”于是《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就在两岸情同手足的出版家们的关爱下继续成长了，感到荣幸的是我的母校出版社给了它在祖国伸展的机会。

近年来，我的思想有了深化，也有了新的线索。譬如，与中原古代姓氏“南门”相关的北方民族族名“乃蛮”，法国学者伯希和说它是蒙古语的数词“八”，而《金史·国语解·姓氏》则说“尼忙古曰鱼”，我想乃蛮是“鱼族”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由于语言的变迁，人们当然不会认为内蒙古奈曼旗是一面“鱼旗”。

我的兴趣始于匈牙利民族的祖缘探究，结论是 Magyar 人的根主要是东北亚地区的通古斯民族。因此长久以来，我一直在匈牙利姓氏中寻找“女真”。最近，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在中文电视新闻字幕上看到现任匈牙利总理姓“久尔恰尼”，我又立即在网上检索到它的原文是 Gyurcsany，匈牙利文“gy”读“dj”、“cs”读“ch”；女真民族自称“朱里真”，而 Gyurcsany 的读音恰恰是“朱儿真尼”。



我们小城里有一位芬兰后裔 Topa 先生，他唯一的东方特征是单眼皮，我告诉过他 Topa 是一个东方姓氏，他很吃惊。德裔旅行摄影家 Gleasner 夫妇则很认同我的人类学见解，如匈奴人血缘融入各欧洲民族和斯拉夫民族是由欧洲人种和蒙古人种融合而成的观点。Gleasner 先生不仅让我拍摄了他的照片，还将他母亲年轻时的照片给我，他说他的某些蒙古人种面型特征是来自美丽的母亲。这两张照片也就成了本书的一部分。

蒙古人种的祖先是来自非洲出走的，他们的体质形态则是在南亚地区滞留期间发育而成的，随着冰河消退，他们北上中原，然后向四方发散，不仅进入北亚、中亚、南亚、近东，而且进入欧洲和美洲。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史前期印欧人种的东迁，他们不可能止步在沙漠中的楼兰；一定有人迈步河西走廊进入中原，一些北方人长得有西方人的隐约特征，是因为这个古老的原因；说那是宋代犹太人东来造成，则是过于短浅的结论。

我所进行的人类-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方向，不仅是在追求精确的结论，更重要的是寻找有效的手段。因此，我鼓励读者对本书的所有结论进行讨论，目的是提升中国人文科学的整体水准。至于那些于大局无碍的不足，也就不去更动了，献给祖国大陆的读者的，只是一个原文略有修改，但尾接了四篇新文章的简体版本。

在改版的过程中，我反复地读了台湾版的《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只发现了两个标点上的疏误和一个错字，显然历史智库出版公司的编辑李惠华女士做了巨大的努力，达成了一部几近完美的出版物，在此我要向她鞠躬行礼。

朱学渊

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原版前言



大约十年前，写了一篇历史语言的研究文章，是说匈牙利人的祖先是女真民族，它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后来又牵出北方民族出自中原的线索和中原人类有戎狄底层血缘的结论，这些论文归集成了《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一书，由北京中华书局以“世界汉学丛书”的一种出版（二〇〇二年初版，二〇〇四年再版）。此后，台北《历史月刊》连续刊载我的文章，原社长虞炳昌先生对我鼓励有加，建议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这就是《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的孕育和出生的由来。

虽然《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较为通俗，但在华夏民族与北方民族同源的问题上，却比《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有了更多的头绪。如上古中原人名大都是后世戎狄族名：虞舜是乌孙、句践是女真、叔孙是肃慎、孟柯是蒙古、墨翟是勿吉、荆轲是准葛尔等等。于是，我就拿北方民族当作上古中原社会的一面镜子，达成了“姬姓、九姓是通古斯民族”、“五帝是爱新氏，华夏是回纥国”等人类学的结论。

中国人“以书证书”的落伍意识，使传统学术自外于世界潮流。直到二十世纪前半叶，因为解读甲骨文字和考古器物的努力，才有了“以物证书”时代的到来。



然而,语言作为另一种传承系统,它的“人类历史化石”的作用,却被国人束之高阁。而这种集体漠视的表面是中国文字研究的优越感,背后却是“大汉语民族”的错误观念,中国人大凡以为万古不变的祖宗,是毋须求证其分合由来的。

本书要推动“以言求真”的研究。夏商两代之际,中原社会经历了“汉语”或“雅言”的一个形成过程;于今来看,此前中原流行的是北方民族的语言,否则许多先秦的人事就无法理喻。如甲骨之“帚”字是“妇”,早已被郭沫若破解;但甲骨氏族名“帚好”、“帚妻”、“帚妹”、“帚妊”、“帚白”、“帚嫫”中的“帚”是音符,还是意符,始终没有正确的理解;如果我们能有语音实证的自觉意识,它们不是“回纥”、“兀者”、“乌马”、“斛律”、“悦般”、“恶来”,又是什么呢?

或许有人会质疑本书书名的科学性:蒙古女真都是后起于唐宋之间的民族,怎么可能是秦始皇的家身?事实上,世间的民族既不可能无中生有,也不可能骤然湮灭,如果上古没有蒙古女真民族,何来孟轲、蒙骜、蒙武、句践、句井疆这样一些春秋秦汉人名?蒙古是东胡鲜卑的后裔,女真是通古斯系民族的代表。说“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是用现代人类的表象,去看古人的血缘和语言的归属,非此还不能把问题说得更清楚。

本书议论秦始皇的身世,选用了忽必烈、慈禧、溥仪、臧克家的面容,只是研究他们的种属,而不是搬弄他们的历史是非。充斥本书的“汉虏同源”的种种立论,却没有任一点政治的企图,因此这是人类学的纯洁探索。而本书又旨在成为一本通俗的读物,所有的注释也都被略去了。

前书《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问世后,曾想在台湾出一个繁体本。后来我在纽约的一次会上结识了周策纵先生,这位有“真君子”之称

的学者，竟于八十六岁的高龄，费时四个月，写就了一篇充满鼓励的《原族——对〈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的几点意见》，《历史月刊》和北京的《读书》杂志都刊行了这篇令人耳目一新，又回味无穷的文章。作为本书的代序，《原族》或许能让读者了解一位 20 世纪大学者的睿智。

推动一种思维，在任何社会中都很困难，在中国社会也无比艰巨。但“中央研究院”院士、世界知名语言学家王士元教授，将我的长文《古代中原汉语中的通古斯、蒙古、突厥语成分》推荐给美国的《中国语言学报》(*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Berkeley)发表。最近，中国语言学界在汉藏语理论的基础上，开始注意汉语中的北方民族语言底蕴，当然又是对我莫大的安慰。

《历史月刊》新任社长东年先生和他的同仁，对《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书稿的接受，引发了我完成使命的喜悦。周策纵、王士元等先生曾给予的帮助，乃至一切对本人学术观点的批评，都有益于学术公器品格之完美。还要感激内人张宁华女士的不懈支持，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携手克服了许多病痛和困难。

朱学渊

二〇〇六年四月十七日

原 族

——对《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一书的几点看法

周策纵

朱学渊博士把二〇〇二年五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他的书《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寄来，说准备在台湾出修订版，并要我写一篇序。我早先就读了他的第一篇文章《Magyar 人的远东祖源》，他说 Magyar（读“马扎尔”，即匈牙利）事实上就是中国历史上的“靺鞨”族。他从“语言、姓氏、历史故事和人类互相征伐的记载中”，勾画出了一个“民族”的始末来，旁征博引，我认为有很大的说服力。后来他又讨论了通古斯、鲜卑、匈奴、柔然、吐火罗等许多种族和语言，一共辑了九篇论文，还有“附录”和“后记”，就成了该书。

大家都知道，十九世纪下半期以来，欧洲一些汉学家由于兼识多种语言，而对中亚、远东诸族的姓氏和源流，多有研考，成绩可观。如斯坦因（Sir Aurel Stein, 1865 - 1943）、沙畹（Édouard Chavannes, 1865 - 1918）、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 - 1945）、马伯乐（Henri Maspero, 1883 - 1945）等尤为显著。中国的冯承钧（1887 - 1947）翻译了不少他们的著作。其实是应该全部都译成中文的。中国学者懂这些语言的太少，像陈垣、陈寅恪都已经去世了，季羨林教授又已年老。将来只能靠年轻一代。

学渊这本书远远超过前人，对北方各少数民族不但索源，并且穷流，指出亚、欧种族和语言融合的关系，发前人所未发。尤其难得的是，他本来是学物理学的，能不受传统人文学科的拘束，独开生路，真



是难能可贵。读了学渊的《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一书之后,不免有许多感想,这里只能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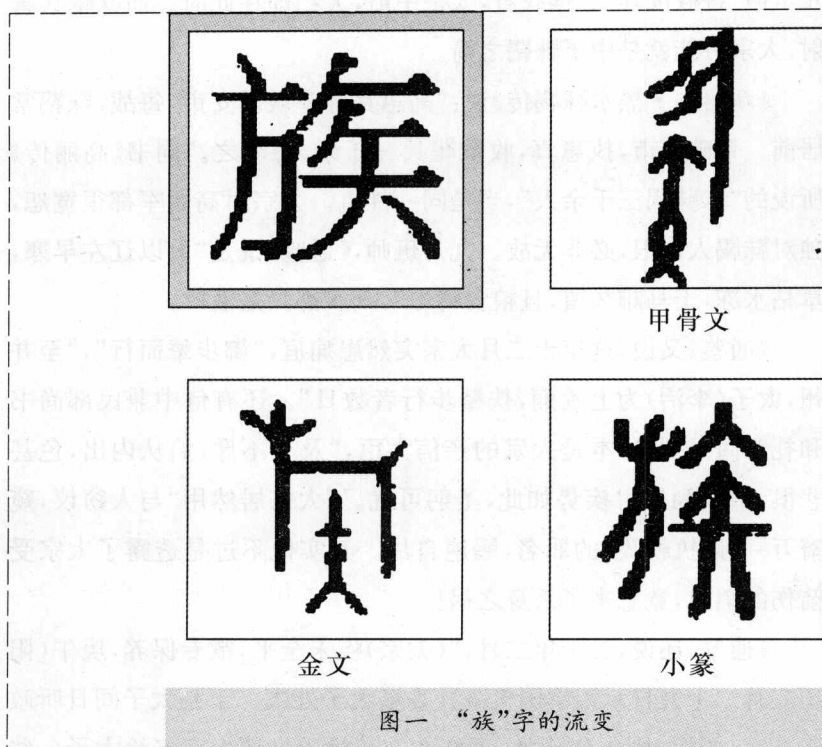
第一,中国人“族”的观念起源很早。至少于三千五百年前甲骨文中的“族”字,就是在“旗”字下标一枝或两枝“矢”(箭)。丁山解释得很对,族应该是以家族、氏族为本位的军事组织。这种现象在北方诸族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旧唐书·突厥传下》说的:

其国分为十部,每部令一人统之,号为十设。每设赐以一箭,故称为十箭焉。……其后或称一箭为一部落,大箭头为大首领。

这里的“箭”,本义为“权状”或“军令”,后来则转义为“部落”了。又像满洲“八旗制度”,将每三百人编为一“牛录”(满语 niru,义为大箭)。因此“八旗制度”和“十箭制度”,也都在“旗”下集“矢”,是军事性的氏族组织。“族”与“矢”的这种关系,可以说中原汉族和北方民族是息息相通的。学渊说北方诸族是从中原出走的,这或许是个合理的证据。

箭是人类早期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对这个字的研究,自然非常重要。它在匈牙利语中是 nyil,芬兰语中为 nuoli,爱沙尼亚语中为 nool,竟都与满语的 niru 如此相近;而汉语中的相关词汇“弩”、“弩”等,是否与之相关,也很值得深思。中国古文字研究,重“形”和“义”之解释,固然有其特殊贡献,但忽略“语音”的构拟,已经被诟病很久了。总有一天是要兼走这条路的,而舍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恐怕不能成功。

第二,关于唐太宗征辽东(高丽)的战争,正史的很多记载并不真实。在学渊的《Magyar 人的远东祖源》一文中,他详细叙述了这场战争,但引用的却多是中国官史的说法。多年前,好像柏克莱加州大学的一位美国朋友赠我一文。他根据高丽方面的记载,说贞观十九年



(公元六四五年)六月安市城(今辽宁海城南)之战,因高延寿、高惠真率高丽、靺鞨兵十五万来救,直抵城东八里,依山布阵,长四十里,抵抗唐军。唐太宗亲自指挥李世绩、长孙无忌、江夏王李道宗(太宗的堂弟)等攻城,然而经过三个月还不能攻下。后来因为太宗中箭,只得在九月班师。

可惜这篇文章一时找不到了,我只能从中国史料来重构一些真相。而中国官方记录都是一片胜利之声,实在离真实很远。据《资治通鉴》说,安市之战时,李道宗命傅伏爱屯兵山顶失职,高丽兵夺据土山。太宗怒斩伏爱以徇,李道宗“徒跣诣旗下请罪”。太宗说“汝罪当

死”，但“特赦汝耳”。据我看，太宗中箭，大约即在此时。而靺鞨兵善射，太宗可能就是中了靺鞨之箭。

《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说：“高惠真等率众援安市，每战，靺鞨常居前。帝破安市，执惠真，收靺鞨兵三千余，悉坑之。”同书《高丽传》所说的“诛靺鞨三千余人”，当是同一件事。太宗对高丽军都很宽恕，独对靺鞨人仇恨，必非无故。九月班师，《通鉴》说是“上以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其实都只是借口。

《通鉴》又说，这年十二月太宗突然患痼疽，“御步辇而行”，“至并州，太子（李治）为上吮痈，扶辇步行者数日”。还有侍中兼民部尚书和礼部尚书刘洎，本是太宗的亲信大臣，“及上不豫，洎从内出，色甚悲惧，谓同列曰：‘疾势如此，圣躬可忧。’”太宗居然用“与人窃议，窥窬万一，谋执朝政”的罪名，赐他自尽。其实他不过是透露了太宗受箭伤的消息，竟惹来了杀身之祸！

《通鉴》还说，二十年二月，“（太宗）疾未全平，欲专保养，庚午（阳历三月二十九日），诏军国机务并委皇太子处决。于是太子间日听政于东宫，既罢，则入侍药膳，不离左右。”褚遂良谏太宗多给太子一些闲暇，说明太宗已把责任都交给太子了。二十二年五月，太子率更长史王玄策击败天竺（印度），得其方士那邈迦娑婆寐，自言寿两百岁，有不死术。太宗令他“采怪药异石”，以求“延年之药”。据我看，太宗是想要治箭疮。二十三年（公元六四九年）五月己巳（阳历七月十日），太宗服丹药反应崩驾。他死后四天才发丧。当时宣布他年五十二，实际只有五十岁。

中国后世史家，甚至写唐史的人都很少留心敌人方面的记载。我只注意到钱穆先生的老师吕思勉在他的《隋唐五代史》里就怀疑官方的说辞。他说：

《新唐书·高丽传》曰：始行，士十万，马万匹，逮还，物故裁千余，马死什七八。船师七万，物故亦数百。（《通鉴》曰：战士死者几二千人，马死者什七八）此乃讳饰之辞，岂有马死什七八，而士财（才、仅）丧百一之理？

当然，他还没有注意到高丽方面的记录，可是有此见解已很不容易了。

第三，关于李唐家族的血缘，前人也有些研究。陈寅恪曾发表两篇论文，认为唐朝皇室基本出于汉族。日本学者金井之忠发表《李唐源流出于夷狄考》一文反驳。陈寅恪又写了《三论李唐氏族问题》来答复。陈说：李唐祖先李熙及妻张氏皆汉族，其子李天赐及妻贾氏亦皆汉族，其子李虎自系汉族，虎妻梁氏固为汉姓，但发现有一例为胡人，乃只好作为可疑了案。陈寅恪是依传统，以男性血缘为主，所以终于认定李唐为汉族。

依照我从男女平等的看法，张姓本多杂胡姓，李唐皇室早已是混血种。李虎之子李昞本身已可疑，其妻独孤氏（即匈奴屠各氏，后改刘氏）当是胡族，他们的儿子李渊（高祖）必是汉胡混种，胡血可能在一半以上。李渊的妻子窦氏（太宗之母）乃纥豆陵毅之女，更是鲜卑族胡人，所以唐太宗的胡血，至少有四分之三。太宗的妻子长孙皇后（高宗的母亲），是拔拔氏（史亦称拓拔氏，也就是拓跋氏），高宗身上汉血的成分已很少很少了。

据陈寅恪考定，高宗做太子时，即烝（上淫曰烝）于太宗的“才人”武则天，太宗死后便直接娶了她。为了避免显得他是直接娶了父亲的爱妾，便又伪造武则天先在感业寺为尼，然后才把她娶来的假故事。这虽像掩耳盗铃，但于胡血甚浓的李唐家族来说，从“父死，妻其后母”的胡俗，又有什么可惊怪的呢？皇族还可略加追索，至于一般

老百姓,当然更是一笔糊涂账。

中国历来对姓氏和血缘的研究就不用心,章太炎在《自述学术次第》中说:“姓氏之学……所包阔远,三百年中,何其衰微也!”姚薇元于抗战前师从陈寅恪,他在一九六三年出版《北朝胡姓考》,于“绪言”中说自己是“以蚊负山”,也不为无故。

第四,这里还必须指出,太宗的妻子长孙皇后,于贞观十年六月己卯(阳历七月二十八日)因病去世,实年仅三十五。她的英年早逝,对唐朝的命运关系重大。身为皇后的她,既好读书,又反对外戚弄权。她的哥哥长孙无忌与太宗是“布衣交,以佐命为元功,出入卧内,帝将引以辅政,后固谓不可”。她向太宗说:“不愿私亲更据权于朝。汉之吕、霍,可以为诫。”(《新唐书·后传》)太宗不听,任无忌为尚书仆射,即宰相之职;她却勉强要哥哥辞谢了。她一死,无忌就当了权,扶持了外甥李治做太子。亲征高丽时,有人建议直取平壤,无忌却主张先攻安市,结果有太宗的中箭。

后来高宗因常患“风眩”,一切由武则天控制。她把唐朝宗室几乎杀尽,连太宗的爱女和女婿,以及她自己的儿女也遭诛杀。长孙无忌遭贬谪赐自尽,褚遂良则死于贬所。武则天终于篡了天下,做了皇帝。说来,在玄武门事变中,太宗把同母兄太子建成射死;自己后来也因中箭伤而崩驾,可谓报应不爽。而他让人把胞兄建成和胞弟元吉的头割下来示众,还把他们的十个儿子都杀光。时元吉仅二十三岁,想必他的五个儿子不过几岁,小孩又有何罪?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说:“是时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视其孙之以反律伏诛,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极矣!”《通鉴》则评得更痛快:“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仪刑(模范)也,后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摹拟),以为口实(借口)乎!”那几代皇帝都要靠军队平

难，方能继位。太宗虽然是一个历史上的好皇帝，但他也为本朝后人树了坏规矩。上述的这些恶果，多少与长孙皇后和魏征的早死有关。魏征死于征辽的两年前。太宗在战事失败后，曾叹曰：“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太宗服丹药丧命，也是皇室的坏榜样，赵翼的书中有“唐诸帝多饵丹药”一条。贞观二十一年高士廉卒，太宗欲去吊唁，房玄龄谏阻，“以上饵药石，不宜临丧”。长孙无忌更一再拦阻。这还不是那印度方士的药，但可见他早就在服丹药了。多年后，李藩对唐宪宗（806—820在位）说，太宗“服胡僧药，遂致暴疾不救”。说的才是那印度方士的药。至于好色和乱伦，更是唐朝皇帝们的家常便饭了。

最后，我想质疑学渊在《Magyar 人的远东祖源》中的一个说法。他引用马长寿的结论说“阿伏于是柔然姓氏”，并且推论说：柔然是继匈奴、鲜卑之后，称霸漠北的突厥语族部落，公元五〇八年被高车族重创；又据欧洲历史记载，一支叫 Avars 的亚洲部落于五六八年进入东欧，曾经在匈牙利地区立国，并统治巴尔干北部地区两百年之久，八六五年为查理曼帝国所灭。欧洲史家认为 Avars 是柔然之一部；学渊以为 Avars 就是匈牙利姓氏 Ovars，或“阿伏于”的别字。很可能是在九世纪末，Avars 与 Magyar 人融合，而成为匈牙利民族的一部分。

我原来以为学渊的推测很巧妙；可是一查他在注释里引马长寿的《乌桓与鲜卑》一书中所说的，不是“阿伏于”，而是“阿伏干”。再查马氏所根据的《魏书·长孙肥传》附其子长孙翰传曰：

蠕蠕大檀入寇云中，世祖亲征之，遣翰率北部诸将尉眷，自参合以北，击大檀别帅阿伏干于柞山，斩首数千级，获马万余匹。

马氏认为入寇云中是在公元四二四年。我查得柞山是在绥远界内，

今属内蒙。

据陈连庆著《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初版,页一九八)说:

《魏书·官氏志》说:“阿伏于氏后改为阿氏。”“于”字系“干”字之误。《姓纂》七歌、《氏族略》均不误。《广韵》七歌误作“于”。

陈氏又说:

《魏书·高祖纪》云:“延兴二年(公元四七二年)二月,蠕蠕犯塞,太上皇(献文帝拓跋弘)召诸将讨之,虜遁走。其别帅阿伏干率千余落来降。”

为什么在四十八年之后,阿伏干又来投降北魏?我再查手头的中华书局标点本,原来陈氏又将“阿大千”错写作“阿伏干”了,他们不是一个人。

我以为“阿伏干”的读音,最接近“阿富汗”(Afghan),而阿富汗人多数说的是一种属于伊朗语言(Iranian language)的普什图语(Pashtu)。当然阿富汗之名的由来还须查实,一九七〇年版《大英百科全书》说 Afghan 的名称是六世纪印度天文学家 Varaha-mihira 首先提到,当时用的是 Avagana。同时期的中国历史似亦有线索,《魏书·西域传》记载过“阎浮謁,故高附翕侯,都高附城”。古之“高附”,就是今之喀布尔(Kabul);莫非“阎浮謁”就是阿富汗?此事还望学渊做进一步探索。

我在这篇序里要强调的有几点:(一)凡对外、对内关系或战争,都应该要比较对方的记录,平衡判断。(二)官方的宣传和记载,不可尽信。(三)偶发事故,像长孙皇后和魏征之死等,往往可有长远重大的后果,历史并非有必然定律可循。(四)美国素来以世界诸族熔炉

自豪,当然可贵,但还只有三数百年发展;中国却早有三数千年的民族融合了。语言、血族、文化、文明的和平交流融会,更可能是将来的趋势。我看这也是朱学渊博士此书最重要的贡献。

二〇〇二年十月五日写成于美国威斯康星州陌地生市之弃园

原载《历史月刊》二〇〇三年一月号

